

一九九六年美國大選中的分裂投票 行為：兩個議題模式的探討

許增如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教育處

摘要

在研究投票行為時，政黨認同常被認為是最重要的解釋因素。但是美國選民「分裂投票」情形的逐年增加，正反映出選民的政黨認同在減弱。兩種理論模型在本論文被用來解釋選民的「分裂投票」行為。一是「政策中和模式」，此模式假設選民投票只是看政策，因為選民對兩黨的政治人物不信任，希望藉由「分裂投票」產生「分治政府」，以使兩黨彼此制衡，並中和政策產出以符合選民的立場。另外一種是「選民期望模式」，此種理論認為：選民是針對不同選舉，一一投票的。因為不同類別的選舉，影響選民投票決定的因素不同，選民對各種職位的期望也不相同。結果便造成選民「分裂投票」的行為。本文的目的即在利用 1996 年美國選舉的資料，來檢測此二模式的解釋力。結果發現，政黨認同的強弱，仍是影響選民「分裂投票」與否的關鍵因素。「政策中和模式」及「選民期望模式」對受訪者是否「分裂投票」，都有相當的解釋力。

關鍵字：分裂投票、政策中和模式、選民期望模式、分治政

投稿日期：民國八十七年八月十二日；接受刊登日期：民國八十八年二月九日。

責任校對：韋俊豪

府、政黨認同

壹、前言

在民主國家，選舉是相當重要的機制，藉由定期舉行的選舉，使人民握有最終的政治權力。特別是在總統制國家，基於分權的制度設計，行政與立法部門各自經由不同的選舉產生，彼此獨立、相互制衡。因此選民很有可能在同時舉行之不同類別的選舉中，投給不同政黨的候選人，這便是「分裂投票」(Split-ticket Voting)的現象。

美國制憲先賢在立憲時，本欲藉著政府各部門分立的制度設計，防止政府過度侵犯人民權利，並扼止政府權力腐化。不過在實際政府的運作上，這樣的制度設計很容易造成僵局，此時就需要政黨的介入了。藉由政黨組織的運作，使政策能夠從決策的三大部門：總統、眾議院、參議院，順利通過。換句話說，選民投票選擇政黨，同時也賦予政黨委任權，使政黨能夠貫徹該黨政策，並負起完全的責任。

是故政黨在整個政治體系中，扮演著選民與政府機制的中間角色。藉由政黨，民主體制方可以順利運作，使人民有權、政府有能，並且有人對施政的結果負責。儘管如此，美國的政黨是從政治環境中，自發形成的產物，而非憲政制度上的設計。如果行政、立法部門分別被不同政黨所把持，同樣會造成政策推動上的困難。從 1955 年以來，「分治政府」(Divided Government)幾乎成為美國政治上的常態。

所謂「分治政府」是指總統所屬的政黨與國會多數黨分屬不同的政黨。放眼美國歷史上，四十二屆總統中共有二十屆面臨到「分治政府」的情況。在 1955 年以前，「分治政府」往往是期中選舉時才會出現，因為選民藉由投票給反對黨，來表達對目前政策的不滿(McAllister and Darcy, 1992)。但是在 1955 年以後，「分治政

府」的出現更為頻繁，甚至在大選年也有這種情形產生。學者在探討「分治政府」的基礎時，發現選民的「分裂投票」行為，可能是造成「分治政府」的原因之一(Thurber, 1991: 1-8)。

何謂「分裂投票」？這是指在同一次選舉中，有好幾種類別的選舉一併舉行，選民將選票分別投給不同的政黨。其先決條件是要有二種以上類別的選舉同時舉行，而且選民可以針對不同類別的選舉分別投票。近年來美國選民的「分裂投票」情形，確實一直在增加(Wattenberg, 1990; Jacobson, 1990: 5-43)。「分裂投票」在美國政治上有幾項意涵：在理論上，代表政黨體系重組 (realignment)¹ 的可能性(Key, 1966; Burnham, 1970)。因為「分裂投票」代表選民行為基本的改變，選民對政黨的忠誠改變了，既有政黨體系的穩定性也在降低。在政策層次上，「分裂投票」會模糊化政府的表現，不過也有學者認為這是選民理性造成的，目的在使行政、立法二者相互制衡(McAllister and Darcy, 1992)。

在研究投票行為時，政黨認同常被認為是最重要的解釋因素。Campbell 等人在 *The American Voter* (1960) 一書中指出，政黨認同是一種如同團體認同般的指標，在個人幼年時即從社會化過程中習得。當一個人的政黨認同越強時，越會支持該黨的候選人，以表達對團體的忠誠。該書也指出，一般美國人對政治的態度是「冷漠」、「不關心」的，所以很少人會根據議題去投票，即使沒有政黨認同，選民會根據個人因素投票或根本不去投票。

此外，從理性抉擇的觀點，選民依政黨認同投票，也是一種節省成本的行為。當選民的資訊不充分時，政黨認同成為投票行為重要的參考依據(Downs, 1957; Fiorina, 1981)。有政黨認同的

¹ 政黨「重組」是指政黨體系產生根本性的變化，政黨的支持者重新排列組合。例如過去甲黨忠實的選民轉而支持乙黨，便是發生重組的現象。不過其類型可以有數種，最典型的討論見諸 Sunquist (1983) 的書。

選民會假設，同黨的候選人與他們看法一致、偏好相同。當資訊越不充足時，選民越會依靠政黨認同做決定。因此，比起選戰中其他的短期因素，政黨認同較能維持長時間的穩定。故在研究投票行為時，常常將政黨認同視為長期性的因素，再觀察與其他短期因素的互動情形，以推估選民最後的投票決定。所以，政黨認同可以說是投票行為研究中，最重要的變數。

如果政黨認同是選民行為主要的參考因素，選民應該會投給其所認同政黨的候選人，只有獨立選民才會「分裂投票」。但是「分裂投票」行為研究的結果顯示，有政黨認同者還是會「分裂投票」。所以有學者指出，「分裂投票」行為的普遍，正代表政黨認同的影響力在衰退 (decline)，獨立選民在增加 (Wattenberg, 1991: 17-22)。當政黨認同的影響力在衰退時，那些因素影響選民做判斷？

本文的目的，即在探討除了政黨認同之外，哪些因素影響到選民「分裂投票」。畢竟政黨認同的衰退只能解釋選民是否「分裂投票」，無法說明選民「分裂投票」的方向，更無法解釋美國「分治政府」背後的意義。本文希望藉由對 1996 年美國選民「分裂投票」行為模式的探討，解釋美國選民為什麼「分裂投票」及如何「分裂投票」，並進一步探究近年來美國選民「分裂投票」增加的成因——除了政黨認同之外，哪些因素影響選民的投票決定。

貳、影響選民「分裂投票」的因素

有不少美國學者試著從候選人的角度，來解釋選民的「分裂投票」行為。畢竟比起其他因素，選民對候選人的評價，與投票決定有著更直接的相關。隨著媒體深入每一個家庭，選舉政治逐漸由政黨中心，發展為候選人為中心 (LoSciuto, 1972)。此外，現任者的優勢在選舉中亦日形重要，McAllister 與 Darcy (1992) 研究 1988

年的選舉資料，發現該年的「分裂投票」是因為選民在國會選舉中，將選票投給現任者所造成的。Beck 等人 (1992) 則認為，與其說是現任者因素造成選民「分裂投票」，倒不如說是現任者享有較高的知名度 (visibility)，吸引選民將選票投給現任者。

不過，現任者因素對「分裂投票」的解釋有限，起碼它無法交代現任者因素為何有利於民主黨，而不是對共和黨，而且也無法解釋開放選舉的情形 (Petrocik, 1991: 14-15)。Petrocik 認為美國「分治政府」主要是肇因於議題上的兩難：總統選舉與國會選舉的議題設定不一樣。總統選舉因為媒體大幅報導，比較受注目，候選人必須在議題上表態。國會選舉則相對地比較不受注意，選民依據黨性、選區服務、口碑來投票。因此 Petrocik 指出，美國的選舉基本上是由政黨認同決定大勢，但是在關鍵因素上有所不同：總統選舉是看那一黨能炒熱議題，國會選舉則是反映政治結構的穩定性，認同民主黨的人比較多，而且民主黨的人選也較佳，因之民主黨經常是國會的多數黨。Petrocik 預言，如果民主黨的議題再加強，美國政府分治的局面可望結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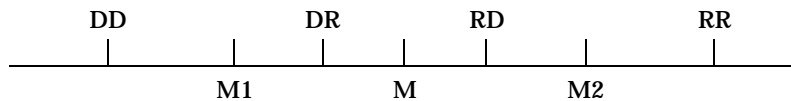
隨著 1980 年代「分治政府」的頻繁，學者們也開始利用議題因素建立起模型，企圖以完整的理論模型，來解釋選民「分裂投票」的行為。主要可分為「政策中和模式」(the policy moderation model) 與「選民期望模式」(the voters' expectation model) 兩派。

一、政策中和模式

「政策中和模式」是由史丹佛大學教授 Fiorina 所提出 (1988, 1989, 1996)。1950、1960 年代「分裂投票」的增加，有的學者認為是因為選民不能辨別兩黨的差異所造成的 (Broder, 1972; Philips, 1975: 134-135)。但對 Fiorina 而言，他認為選民不但能區別政黨意識型態的差異，而且是將各項選舉一併考慮的，特別是國會與

總統的選舉。當選民的意識型態立場位在兩黨中間時，選民會有意識地藉由「分裂投票」結果以產生「分治政府」，利用行政與立法部門分屬不同政黨，中和政策產出以符合選民的立場 (1988: 442-453, 1989: 24-28, 1996: 72-81)。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也代表著選民對兩黨政治人物的不信任，所以選民利用「分裂投票」產生「分治政府」，藉由行政立法部門相互制衡，以使政策維持中道 (Fiorina, 1990)。其他學者也有類似的看法，Erikson (1988) 甚至認為國會的期中選舉是一種「延遲性的分裂投票」(lagged ticket-splitting behavior)，選民的目的是為了制衡白宮。但是選民如何「分裂投票」，則代表著不同的意涵。Fiorina 發展出一種左右單向度的尺度 (見圖一)，來解釋選民各種「分裂投票」的組合 (1988, 1989, 1996)。



圖一：Fiorina 政策中和模式(D 代表民主黨；R 代表共和黨)

Fiorina 認為，基本上政策是看總統及國會多數黨的立場而定，當中總統又比國會議員更具有影響力。因此，比方說選民的立場是中間偏民主黨時，他會將總統選票投給民主黨、眾院投給共和黨 (DR)。依此類推，選民在此二項選舉中，共有四種配對模式 (如圖一所示)，選民會選擇與其立場最接近的組合。位於尺度兩端的選民，會直接一致投票 (RR DD)，只有介於 M1 與 M2 之間的選民，也就是位於兩黨中間的選民，才會選擇「分裂投票」。

許多美國學者更進一步驗證 Fiorina 的理論。首先 Alvarez 與 Schousen (1993) 利用 1972 到 1988 年美國密西根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y, 簡稱 NES) 資料，檢測選民的議

題立場是否會造成「分裂投票」。他們控制了政黨認同強度、地域、現任者因素與政治功效感，檢測：選民的意識型態或議題立場，是否會造成「分裂投票」。結果發現意識型態變數在五次選舉中，均未達統計上的顯著，顯示意識型態與議題立場不必然會造成「分裂投票」。除此之外，Alvarez 等人檢測意識型態與「分裂投票」在方向上的關係。結果也不支持 Fiorina 的假設，選民較偏向那一個政黨，並無助於預測他總統投誰。而且大多數的選民都認為他們介於兩黨之間，只有 1984 年的資料略符合 Fiorina 的假設。

Born(1994)同樣在驗證 Fiorina 的理論。他用 1980 到 1988 年 NES 的資料，也發現 Fiorina 的模式無法解釋選民是否「分裂投票」；期中選舉反而比較符合 Fiorina 的理論，但是判定係數(R-squared)偏低。接著他進一步檢證「分裂投票」的方向，將認為「總統決定政策」者，予以加權，結果發現：只有選民在與兩黨距離相等時，才會「分裂投票」。只要選民偏向那一黨，選民都會比較傾向一致投票給該政黨。Born 又一討論政策中和模式的五項命題：

(1) Fiorina 認為意識型態在兩黨中間的選民，比較可能「分裂投票」；並利用政策的中和，來滿足選民個人的立場。但是 Born 認為選民未必會將兩種選舉加在一起考慮，Born 的研究發現：政治知識越多者，越會「分裂投票」。1980 年是疏離者比較會「分裂投票」，只有 1988 年意識型態的影響達顯著，符合 Fiorina 的假設，但是其他變數都太弱，Born 認為「分裂投票」的原因還有待進一步發掘。

(2) Fiorina 認為選民在政策上，會覺得總統比國會更具影響力。Born 證實受訪者的立場與所投總統候選人的政黨較為接近，特別是分裂投票者。

(3) Fiorina 進而指出，當兩黨意識型態立場距離越遠時，介於

兩黨之間的選民越多，選民「分裂投票」的情形就越多。不過 Born 檢驗的相關係數是負的，顯示當兩黨的意識型態立場越遠時，「分裂投票」的選民反而越少，與 Fiorina 的假設不符。

(4) 因此 Fiorina 認為當政黨立場越往中間移動時，則「分裂投票」較可能發生。Born 認為方向剛好相反，應是政黨愈往中間移動時，一致投票的情形愈會增加；其中民主黨增加的比共和黨多，可見民主黨的組合較為複雜。

(5) 此外，「分裂投票」的方向會受到總統與國會權力大小不同所影響，故 Fiorina 用加權值來加重總統的政策立場。Born 則認為 Fiorina 用對數模型 (logit) 算出的加權值不對。起碼選民在與兩黨的差距相等時，無法算出選民「分裂投票」的方向。不過儘管如此，認為總統權力越大者，確實越可能會「分裂投票」。

總之，Born 認為「政策中和模式」無效的原因，是因為這兩種選舉關注的議題不同。國會選舉的議題比較地域性，強調選區、個案服務。即使選民想要制衡行政權，未必會用國會的選票。而且選民也未必要靠政黨制衡，有時候同黨候選人也可以發揮制衡的力量。Born 認為 Fiorina 的模式並不切合一般選民的政治思考。Fiorina 隨後提出反駁 (1994)，他先前就已言明：他的分析是「初步的」(preliminary)，並不是模式 (1988)。他是在提供另一種政策模型的假設，而且「新模型不會比傳統模型更差」。Fiorina 認為問題是出在：個人的計算不能用經驗驗證，因為偏好的特質涉及理性抉擇途徑 (rational choice model)，要證明必須用空間模型 (spatial model) 或透過無異曲線來證明選民的偏好順序。Fiorina 認為影響「分裂投票」行為的因素很多，「政策中和模式」只算是當中之

一。

密西根學派的研究焦點在於：那些因素影響個人的投票行為與投票決定。Fiorina 認為就算是發現政黨認同或現任者因素，有很大

的影響，不過只是「小孩子的遊戲」——太過於簡化選民整個投票決定的過程，更困難的是在於其他複雜的部分。經驗研究的資料也顯示：分裂投票者的議題立場通常較接近共和黨，所以共和黨在行政部門的選舉表現較佳，這些重要性不是用判定係數所能表示的。Erikson (1988)、Alesina 和 Rosenthal (1989) 將「政策中和模式」成功地運用在期中選舉上，說明為何期中選舉比較重視經濟因素，而且為何對執政黨較為不利。總而言之，Fiorina 認為經濟學的理论比政治學更為先進，Born 的證明太過於簡化，而且是政治上的，除非有更好的理論，不然不能輕易將既有的理論推翻。

二、選民期望模式

除了 Fiorina 之外，1980 年代末期，另一位致力於「分裂投票」研究的是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教授 Jacobson。他以過去對國會選舉的研究為基礎 (1985a, 1985b, 1989, 1991, 1992)，進一步在 *The Electoral Origins of Divided Government* (1990) 一書中，探討「分治政府」的選舉來源。由於 1980 年代的「分治政府」，多是共和黨主宰白宮、民主黨控制國會的形式，Jacobson 藉由對民主黨在眾議院選舉中優勢的探討，進而解釋美國選民「分裂投票」的原因及模式。

一般美國學者認為民主黨久占國會多數，可能有兩種原因：結構性與政治性的。結構上的因素是指，民主黨濫用在位的優勢，利用「傑利蠟蠟」(gerrymandered district)² 或其他職權，維持

² 「傑利蠟蠟」(gerrymandering) 是一種不公平的選區劃分方式，即以對某個政黨或利益團體有利的方式劃分眾議員選區，使該黨的選票能夠獲得最經濟的運用。美國每十年都要進行一次選區重劃，選區常被劃分的奇怪形狀，通常是議會多數黨才可運用此優勢。例如少數黨雖可在兩個選區得到十比一的大勝，但是卻可能在五個選區以二比三敗給多數黨。在 1812 年時，麻州所劃分的不規則選區，被政治漫畫家畫成一隻蜥蜴 (palamander)；由於當時的州長叫傑利 (Elbridge

既有的利益，而且現任者的資源也確實比挑戰者豐富。

Jacobson 從兩個角度來證明結構性的因素並不充分。首先，他以 Mayhew (1974) 所提的“vanishing marginals”來證明。所謂的“vanishing marginals”是指現任者連任的得票數，並不穩定，現任者領先挑戰者的得票數，起伏相當大。雖然自 1960 年代起，眾議院現任者平均得票數的百分比一直在上升，但是得票數的標準差也變大，現任者還沒到連選連任的地步 (1990: 26-27)。

其次，Jacobson 假設：如果先前民主黨連任的選區，在開放競選後變成共和黨贏，就可證明民主黨的連任，確實有不公平的情形 (1990: 32-37)。但是 Jacobson 的研究發現，共和黨人在開放選舉中的進展非常有限。所以民主黨在眾議院的優勢，並非是結構性因素，而是政治性因素，即民主黨的眾議員人選比較能得到選民的支持。

在 1940、1950 年代，國會現任者連任失敗主要是因為選區的黨性及全國性的潮流。但是 Jacobson 發現近年來，選區選民不再依賴黨性，挑戰者如果要贏，除了要借重全國性的情勢，更重要的是在地方上的努力。Alford 與 Brady (1988) 也指出，現任者之所以得到大部分選票，是因為能夠代表選區，而非政黨因素。

Jacobson 回顧過去四十年，在不同選區、不同屆選舉中，游離票日漸增加，眾議員與總統選舉結果的相關性日益縮小。成功的總統候選人往往得到比同黨議員候選人更多的選票，國會則是由現任者繼續鞏固其原有的席位 (Born, 1984; Mondak, 1989)。這反映出政黨對選民投票行為的重要性在下降，這也是美國在二次大戰後最明顯的選舉特質。Jacobson 認為可能是以下幾個原因造成

Gerry)，所以一位報紙編輯乃將這種只顧黨派私利的選區劃分，稱為「傑利蠅蠟」(gerrymandering)。

的(1990: 5-43)：

(1) 政黨對選民的效用在改變。原先政黨標籤提供選民資訊，並用來反映選民的政策偏好。但是後來諸如人權、越戰、墮胎權等議題，選民不再能明確區分政黨的議題立場及預測候選人當選後的作為，所以有關候選人的資訊更形重要。

(2) 媒體的發達，助長選民獲取資訊的機會。黨性的減弱使得國會現任者，更易於經營他自身的人際網絡，並吸收另一黨的票源，候選人逐漸變成選戰的核心。這也使得選情及政黨競爭，變得更開放而多變。

在黨性減弱的情況下，民主黨之所以能在眾議院占有優勢，主要是因為他們的人選比較優秀 (Jacobson, 1990: 45)。一個機警的政治人物不會投入沒有把握的選舉；同樣地，人們也不會資助沒有希望贏的候選人。是故條件越好的候選人，越會吸引較多的資源；而資源越多，也會吸引更多的候選人投入選戰 (Jacobson, 1980; Jacobson and Kernell, 1983)。Jacobson 發現，民主黨的候選人比共和黨的人選，更具有擔任公職的經驗；而且民主黨的候選人比起共和黨，更能回應全國的情勢 (Jacobson and Kernell, 1983; Jacobson, 1989)。是故民主黨的現任者可以掌握更多的資源，而共和黨人也不敢冒然投入沒有把握的選舉。

Jacobson 進一步歸結「分治政府」的成因，即是來自選民的「期望」。Jacobson 假設：選民認為政府行動的目的是為了「公共財」(public goods)，大多數的選民都希望政府提供服務，所以他們投給最能代表大多數人心聲的政府。但是由於政府的計畫是公共財，理性的個人又會考慮搭便車，讓別人負擔成本 (Olson, 1965)。這具體反映在選民的議題偏好上，選民一方面希求政府提供服務，但是另一方面又不希望政府加稅或增加支出。

此種期望的衝突正好與選民對國會及總統期望的矛盾相符。

由於總統的選區遍及全國，選民期望中的總統必須能照顧全民的利益；另一方面，選民認為國會議員是「法定代表」(delegates)而非「委任者」(trustees)，所以要求國會議員要能代表選區利益，選民認為國會議員在選區服務上的努力，比全國性的立法更為重要(Jacobson, 1990: 112-115)。

過去幾十年的政黨發展，使選民在印象中認為：共和黨在追求公共財，維持低稅負、經濟繁榮與強大國防等議題上表現較佳；民主黨則是擅長照顧少數團體與中下階級、提供社會救助、改善失業與農業問題、促成預算公平分配等議題(Jacobson, 1990: 105-112)。因此在總統選舉上，選民是根據全國性議題及治理能力投票，所以選民傾向投給共和黨的人選。相形之下，民主黨常被選民視作討好少數利益，是一種「自由主義的濫用」(the taint of liberalism)，會增加稅收及支出、對家庭與社會秩序有著奇怪的看法(Miller *et al.*, 1988)，這對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較為不利。

反觀國會議員選舉，一般選民則是偏重候選人個人特質、經驗、選區服務與地方議題。就此而言，共和黨國會議員候選人的意識型態較為保守，不利於國會選舉，而且當總統為共和黨籍時，共和黨議員還必須為行政部門的缺失措黑鍋。相較之下，民主黨國會議員候選人比較能符合選民的需求，能夠照顧地方上的利益(Jacobson, 1985b)。

從大環境上來看，美國經歷過 1970 年代末期的通貨膨脹與能源危機，國內正瀰漫著保守的氣氛，1980 年代的情勢其實是對共和黨有利。但是要打敗國會現任者，有三個條件：好的候選人、好的理由、錢。由於當時正是共和黨執政，沒有議題可以炒作，理性的共和黨人不會參選。在候選人太弱的情況下，以致於該黨不能掌握時機。是故總統的表現好，必須當總統與國會多數黨同一政黨時，國會的席位才會增加；這使得共和黨的國會議員在面

臨「分治政府」時，更為不利。因此共和黨唯有當民主黨執政，才能獲得較多的席位。所以 Jacobson 認為：「分治政府」的基礎不是結構性，而是政治性的——是候選人、議題、選舉聯盟及選民行為所造成的。

Alvarez 與 Schousen (1993) 比較 Fiorina 與 Jacobson 兩種模式，來檢測「分治政府」的選舉來源，結果是 Jacobson 的模式比較有解釋力。他們以 1988 年 NES 的選舉資料，發現全國性議題與總統選舉高度相關；對國會選舉沒有直接影響，只有在「減少赤字」及「社會救濟」兩議題上，與國會選舉相關達顯著。相較之下，國會選舉偏重地方議題及選區服務，只有少部分是靠政黨認同及總統的裙帶效應 (Ferejohn *et al.*, 1987; Calvert *et al.*, 1983; Campbell, 1986)。

他們進一步假設：聯邦政府的支出越大，經費也就越多，對國會現任者就越有利，特別是民主黨的現任者。結果發現：現任者確實靠「肉桶立法」(pork-barrel legislation)³ 獲取選區支持，特別是當選區分配到的聯邦預算越多時，選民越知道現任者，並對其越有好感。此外，選民與媒體的接觸情形也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即選民越常接觸媒體越可能認識選區的現任議員。不過 Alvarez 等人認為，政治學者應致力於探究「分裂投票」的一般模式，Jacobson 的模式雖然比較有解釋力，可是只解釋了一個方向的「分裂投票」：總統投共和黨、眾議員投民主黨；卻沒有包括另一方向的組合(民主黨總統與共和黨的眾議員)。

Jacobson 雖然用「選民期望模式」來解釋選民「分裂投票」的

³ 「肉桶立法」是指在立法過程中，議員各自提出有利自己選區的方案，例如：修橋鋪路等，透過多位議員聯手合作，相互支持對方所提出的方案，以求彼此的方案都能夠順利在議會中通過。這種支持無關乎議員們的信念，純粹是互相給予方便，結果常會造成政府支出的浪費。

原因，但是他主要的目的還是在解釋「分治政府」的選舉來源，而且偏重於解釋民主黨在國會選舉中的優勢，並未對選民的「分裂投票」行為，做詳細的解釋與研究。Zupan (1991a) 延續 Jacobson 對選民「分裂投票」的假設，認為選民確實對不同職位有不同的期望。不過 Zupan 與 Fiorina 一樣，都企圖從經濟學的理论模式來解釋選民的「分裂投票」行為。Zupan 提出三個假設：

- (1) 選民可以在兩個主要的政黨之中二選一；
- (2) 國會負責處理全國性與地方性的議題；
- (3) 共和黨的國會議員，因為意識型態保守，比較不願意去追求地方上的利益。

因此選民「分裂投票」的情境正符合「囚犯困境」理論 (the Prisoner's Dilemma theory)。「囚犯困境」是指當每個人都做最有利的選擇時，所得出的結果反而對全體都不利。選民在國會選舉中，為了確保自己選區的利益，會盡量投給民主黨的候選人，不然別的選區選民也會支持民主黨。但是如此一來，政府的支出反而會增加，為了避免政府支出增加，選民傾向投給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以免增加稅賦及支出，並兼顧全民的福利。這個理論解釋了選民為什麼及如何「分裂投票」。

此外，這個理論也解釋了許多既存的現象。選民一方面輕視國會，但卻欣賞自己選區議員的表現。眾議院議員若太注意全國性議題，反而會席位不保。而美國南方各州的選民長期支持民主黨議員，是因為這些議員為選區提供了不少「肉桶立法」。故共和黨在選區越大的選舉中，通常表現得就越好。

不過 Zupan 也指出，「囚犯困境」理論並不能解釋所有的選舉分歧，例如：同一州選出不同政黨的參議員，可能還有其他的原因；又如期中選舉總統所屬政黨的挫敗，還需要其他的解釋。再者，地域及現任者因素與「囚犯困境」之間的關係，還需要做進一

步的研究。因此「囚犯困境」理論只能部分解釋：為什麼共和黨在行政部門的選舉較為有利。

從前面的文獻檢閱，我們發現：無論是 Fiorina 的「政策中和模式」或是 Jacobson 的「選民期望模式」，對美國選民的「分裂投票」行為，似乎都有相當的解釋力。隨著美國 1992 年的大選結果揭曉，民主黨不但贏得參、眾兩議院多數，而且打敗尋求連任的共和黨總統布希，贏得總統選舉，結束共和黨為期十二年主宰白宮的局面，難道「分治政府」的現象就此結束了嗎？其實不然。1994 年的期中選舉，共和黨首度自 1952 年以來，取得眾議院過半數席位，成為參、眾兩議院的多數黨，美國「分治政府」的局面再度出現。1996 年的大選結果，更是確立了民主黨與共和黨分庭抗禮的局勢。這樣的選舉結果，相當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究美國選民「分裂投票」行為的成因，本文的目的在於檢證美國 1980 年代發展出的兩大議題模式——「政策中和模式」及「選民期望模式」，對 1996 年美國選民「分裂投票」行為的解釋力，並進而試圖瞭解造成美國「分治政府」的根本成因。

參、假設

本文對「分裂投票」的定義，是指在總統大選年中，選民在總統，及眾議員兩種選舉中，分別投給不同政黨的候選人。基於上述對影響美國選民「分裂投票」因素的探討，我們認為選民是否「分裂投票」，與政黨認同的強弱密切相關。我們認為政黨認同對美國選民的投票決定，仍是很重要的因素。只有當政黨認同的強度越弱時，選民的投票決定越不會考慮政黨因素，越有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進而產生「分裂投票」行為。

其次我們要檢證「政策中和模式」及「選民期望模式」兩個議

題模式，對美國選民 1996 年分裂投票行為的解釋力。根據議題理論，政黨往往有其專屬的議題，這主要是肇因於過去的歷史背景、政黨成立時的黨綱或意識型態等，久而久之在選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選民藉以作為投票判斷的依據。至於政黨也會盡量處理對自己有利的議題，以向選民展示自己處理議題的能力，進而爭取最多的選票。因此選民與議題之間的關係，就好比消費者與貨品，政黨及候選人必須依據市場規則，盡量生產吸引人的財貨——即議題或政策，以博取最多選民的支持。

在「政策中和模式」中，是假設選民能夠分辨兩黨的議題及意識型態立場，而且選民是將總統與眾議員選舉一併考量的。當選民的議題或意識型態立場位在兩黨中間時，選民會傾向選擇「分裂投票」，企圖藉投票結果產生「分治政府」，以中和政策產出，並符合選民自己的議題立場 (ideal point)。除此之外，「政策中和模式」假設一般選民認為總統的影響力大於國會，因為總統一人就可以提案推動政策，國會還須有相當比例的議員支持才行，因此議題立場位在兩黨中間地帶的選民，比較傾向投給與自己立場較接近的總統候選人。也就是說，選民與兩黨議題立場之間的距離，同時也決定了選民「分裂投票」的方向。

另一個影響選民「分裂投票」行為的議題模式，是「選民期望模式」。這個模式不但假設選民能夠認知兩黨的議題立場差異，而且選民對總統與眾議院議員兩種職位本身，也存有不同的期望，因而造成選民「分裂投票」。「選民期望模式」假設選民理想中的總統人選，是能夠處理好全國性的議題，例如國防、外交、經濟等議題；而選民理想中的眾議員人選，則是能夠處理好選區服務等地方性議題，因此選民傾向會將選票投給符合兩種職位不同期望的政黨。一般而言，共和黨比較擅長處理全國性議題，民主黨則比較擅長選區服務，因此 1980 年代的「分治政府」正是共和黨

掌控白宮、民主黨主導眾院的型態。但是到了 1992 年，這種情況有了改變，民主黨成功入主白宮，1994 年更是產生逆轉，美國政府依舊是「分治政府」——只是民主黨主導白宮、共和黨掌控眾院。究竟是選民對這兩種職位的期望改變了？還是政黨的議題立場有變化？抑或「選民期望模式」無法真正解釋美國選民的「分裂投票」行為？這些都有待經驗資料做進一步的驗證。

以 1996 年美國選民的投票行為為分析對象，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因為這是最近一次舉行的美國大選，分析該次選舉有助於瞭解美國選民的最新意向；其次該次選舉結果產生的「分治政府」，是民主黨政府與共和黨國會的型態，剛好與 1980 年代「分治政府」（共和黨總統與民主黨國會）的模式相反，多數有關美國選民「分裂投票」行為的理論假設均以 1980 年代的情形為基礎，以 1996 年的選舉為分析對象將有助於檢證這些假設。

本文的研究架構如圖二。依變數有兩個：一個是選民是否「分裂投票」；另一個是選民如何「分裂投票」。綜上所述，「政策中和模式」與「選民期望模式」對這兩個依變數，都提出了若干假設，我們將一一驗證這些假設對 1996 年美國選民「分裂投票」行為的解釋力。至於選民政黨認同的強弱，則是與選民是否「分裂投票」直接相關，甚至會影響到這兩個議題模式對選民是否「分裂投票」的解釋力，故政黨認同強弱與議題模式二者，可能呈現交互作用。至於選民政黨認同強弱與「分裂投票」方向，則無理論上之因果關係。



圖二：研究架構

本論文的資料來源是 NES 在選前九週及選後第二天立即所作的二波面訪。以 1996 年 11 月 5 日前有投票權的美國公民為母體，分地區、階段抽樣。其中 77% 的受訪者在 1992 年或 1994 年曾有受訪的經驗，另外 23% 的受訪者則是分區抽出的新受訪者。選前成功樣本共計是 1714 份，選後是 1534 份，變數總共有 1657 個。

肆、資料分析與研究發現

首先，我們來看看 1996 年美國選民「分裂投票」的情形(見表一)。⁴ 在 925 個有效樣本中，絕大多數的受訪者選擇一致投票 (81.5%)，即總統與眾議員選舉皆投給同一政黨的候選人，其中 42.4% 投給民主黨的候選人，39.1% 投給共和黨的候選人。至於「分裂投票」的情形，約占 18.4%，其中總統投給民主黨、眾議員投給共和黨約占 13.8%，而總統投給共和黨、眾議員投給民主黨約占 4.6%，顯示 1996 年美國選民的「分裂投票」行為，傾向總統投民主黨、眾議員投共和黨的組合。而且總體而言，絕大多數的受訪

表一：受訪者在 1996 年選舉的投票決定

		總統選舉		合計
		民主黨 (柯林頓)	共和黨 (杜爾)	
眾議員 選舉	民主黨	393 (42.4%)	42 (4.6%)	435 (47.1%)
	共和黨	128 (13.8%)	362 (39.1%)	490 (52.9%)

⁴ 由於本文的重點在分析兩種議題模式對選民「分裂投票」的影響，而這兩種議題模式皆是以政黨的議題立場，或政黨的議題表現作為假設的依據，因此 1996 年美國總統選舉中的獨立候選人裴洛 (Perot)，及投給裴洛的受訪者，將不列入本文的分析範圍之內。

合 計	521 (56.3%)	404 (43.7%)	925 (100.0%)
-----	----------------	----------------	-----------------

者總統也是投給民主黨的候選人 (56.3%)、眾議員選舉則是投給共和黨 (52.9%)，正反映出 1996 年民主黨入主白宮、共和黨成為眾議院多數黨的投票結果。

一、政黨認同與「分裂投票」的關係

Wattenberg (1991: 3) 曾指出「『分治政府』的核心就是美國政黨在衰退 (decline)。因為『分治政府』是靠『分裂投票』產生的，『分裂投票』正是黨性弱化的表徵。」研究「分裂投票」的學者大都發現，「分裂投票」的選民大多是沒有政黨認同或政黨認同弱的人 (Campbell and Miller, 1957; Maddox and Nimmo, 1981)。

我們以 NES 選前問卷調查所得到的受訪者政黨認同傾向分析，結果發現：在 1996 年美國選舉中，選民「分裂投票」行為確實與政黨認同的強弱顯著相關 (見表二)。在政黨認同強的受訪者當中，高達 91.24% 選擇一致投票，只有 8.76% 選擇「分裂投票」。政黨認同弱及無政黨認同的受訪者，則較不傾向一致投票，相較於政黨認同強的受訪者，分別只有 77.42%、70.93% 選擇一致投票，相對地這些政黨認同弱或無政黨認同的受訪者選擇「分裂投票」的

表二：政黨認同強度與「分裂投票」的交叉列表

次數分配 百分比		分裂投票		合計	統計檢定
		否	是		
政黨認同 強度	獨立選民	161- (70.93%)	66+ (29.07%)	227	自由度 2 卡方值 47.26 p<.0001
	弱	240- (77.42%)	70+ (22.58%)	310	
	強	354+ (91.24%)	34- (8.76%)	388	
合 計		755 (81.62%)	170 (18.38%)	925	

註：‘+’表示統計上顯著偏高；‘-’表示統計上顯著偏低。

比例，則有 22.58% 與 29.07%。顯示政黨認同的強弱確實與「分裂投票」與否密切相關，政黨認同越強，選民越傾向一致投票，相反地，當選民政黨認同越弱時，選民則越傾向「分裂投票」。

由於政黨認同的概念除了強弱之分外，還有類別上的區別，強烈認同民主黨者未必與強烈認同共和黨者投票傾向完全相同，過去曾有研究發現，強烈認同共和黨者「分裂投票」的情形，比強烈認同民主黨者多了兩倍 (Maddox and Nimmo, 1981)，因此，我們有必要進一步比較不同類別及強度政黨認同的選民，在「分裂投票」行為上的差異。

表三即為受訪者政黨認同類別及強度與「分裂投票」的交叉列表。在不同政黨認同類別中，強烈認同共和黨者一致投票的比例最高，高達 95.48%。其次是強烈認同民主黨者，有 87.26% 選擇一致投票，兩黨均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相對地，兩黨的強烈認同者也比較不會「分裂投票」，分別只有 4.52% 及 12.74% 選擇「分裂投票」。認同民主黨較弱者及獨立選民，則比較傾向「分裂投票」。

表三：政黨認同類別及強度與「分裂投票」的交叉列表

次數分配百分比	一致投票	分裂投票	合計	統計檢定
認同共和黨—強	169+ (95.48%)	8- (4.52%)	177	自由度 4 卡方值 54.97 p<.0001
認同共和黨—弱	117 (78.52%)	32 (21.48%)	149	
獨立選民	161- (70.93%)	66+ (29.07%)	227	
認同民主黨—弱	123- (75.93%)	39+ (24.07%)	162	
認同民主黨—強	185+ (87.26)	27- (12.74%)	212	

合 計	755 (81.45%)	172 (18.55%)	927	
-----	-----------------	-----------------	-----	--

註：‘+’表示統計上顯著偏高；‘-’表示統計上顯著偏低。

分別有 24.07%、29.07%。這顯示出在 1996 年的選舉中，民主黨的認同者似乎比共和黨的認同者，較有「分裂投票」的傾向。

為了進一步驗證是否政黨認同越強者，越傾向一致投票，而且是投給自己政黨的候選人，我們有需要進一步看看政黨認同強弱及類別與「分裂投票」上的相關性（見表四）。結果發現，政黨認同的類別及強弱與選民的投票方向上，顯著相關，而且呈現出一種線性的關係，即受訪者的政黨認同越強，越傾向一致投票，而且是投給自己認同政黨的候選人。在強烈認同共和黨者中，有 94.9% 一致投票給共和黨的候選人；至於強烈認同民主黨者中，87.3% 一致投票給民主黨的候選人，皆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至於其他種投票組合，對於兩黨的強烈認同者來說，也是顯著偏低的。

表四：政黨認同類別及強度與「分裂投票」方向的交叉列表

次數分配 百分比	分裂投票的方向(總統-眾議員)					統計檢定
	D-D	D-R	R-D	R-R	合計	
認同共和黨—強	1- (0.6%)	5- (2.8%)	3- (1.7%)	167+ (94.9%)	176	自由度 12 卡方值 714 p<.0001
認同共和黨—弱	13- (8.8%)	18 (12.2%)	13+ (8.8%)	104+ (70.3%)	148	
獨立選民	82- (36.3%)	49+ (21.7%)	17+ (7.5%)	78 (34.5%)	226	
認同民主黨—弱	111+ (68.9%)	31+ (19.3%)	7 (4.3%)	12- (7.5%)	161	
認同民主黨—強	185+ (87.3%)	25 (11.8%)	2- (0.9%)	0- (0%)	212	
合 計	392 (42.5%)	128 (13.9%)	42 (4.6%)	361 (39.1%)	923	

註：‘D’表示民主黨；‘R’表示共和黨。‘+’表示統計上顯著偏高；‘-’表示統計上顯著偏低。

對於兩黨政黨認同較弱的受訪者，則比較傾向一致投票給所認同政黨的候選人，或是傾向「分裂投票」。不過他們「分裂投票」的組合，都是傾向將總統投自己所認同的政黨，眾議員則投給另一個政黨。認同共和黨較弱的受訪者，有 70.3% 一致投票給共和黨，8.8%「分裂投票」給共和黨總統與民主黨眾議員，在統計上顯著偏高。至於認同民主黨較弱者，則是傾向一致投票給民主黨 (68.9%)，或「分裂投票」給民主黨的總統及共和黨的眾議員 (19.3%)，二者在統計上亦顯著偏高。這樣的結果顯示出，即便是選民的政黨認同在下降、選民「分裂投票」的情形增加，政黨認同對於選民的投票決定，還是有一定的影響力與解釋力。

至於獨立選民，則是明顯傾向「分裂投票」。在表示無政黨認同的受訪者當中，有 21.7% 總統投民主黨、眾議員投共和黨，7.5% 總統投共和黨、眾議員投民主黨，這比起其他組政黨認同類別，在統計上顯著偏高。而獨立選民則較不傾向一致投票，其中一致投給民主黨的候選人，在統計上顯著偏低，有 36.3%；獨立選民一致投票給共和黨的候選人，則占 34.5%。

二、政策中和模式

Fiorina 的假設，多是利用「空間模型」做推論，有待經驗資料做進一步的檢證。我們分成三個步驟來檢證：(1) 選民是否能夠分辨兩黨的意識型態及議題立場；(2) 意識型態及議題立場位在兩黨中間的選民，是否比較傾向「分裂投票」；(3) 在「分裂投票」的方向上，是否選民會投給與自己立場較接近的總統候選人。

我們仿造 Fiorina 的方法 (1996: 78-79)，先來看看受訪者是否能夠分辨兩黨、兩黨總統候選人及受訪者自己的議題立場 (見表五)。我們利用 NES 在 1996 年選前面訪的資料，當中幾個有關議題的七點量表，結果發現：從有效個案數可以看出，大多數的受

訪者都能夠定位自己、兩黨及兩黨總統候選人的議題立場。

表五：選民、兩黨及兩黨總統候選人的平均議題立場

議 題 (1-7)		有效 個案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意識型態 (開放—保守)	共和黨	1566	5.09	1.41
	杜 爾	1566	5.14	1.42
	受訪者	1350	4.34	1.38
	柯林頓	1617	3.15	1.47
	民主黨	1577	3.18	1.44
政府是否應盡量提供服務 (減少支出—增加服務)	共和黨	1410	3.07	1.35
	杜 爾	1577	3.16	1.33
	受訪者	1467	3.87	1.52
	柯林頓	1655	4.92	1.38
	民主黨	1412	5.10	1.30
國防支出 (減少—增加)	共和黨	1390	4.74	1.28
	杜 爾	1485	4.67	1.29
	受訪者	1495	4.04	1.43
	柯林頓	1590	3.92	1.48
	民主黨	1399	3.79	1.39
環境保護 v.s. 工作機會 (環保優先—工作優先)	共和黨	1353	4.74	1.27
	杜 爾	1465	4.56	1.27
	受訪者	1479	3.52	1.55
	柯林頓	1566	3.43	1.41
	民主黨	1366	3.36	1.31

其次從受訪者認知各政黨及候選人議題立場的平均數來看，兩黨的議題立場在空間上，確實呈現左右向度的關係。在意識型態上，受訪者認為杜爾的立場最為保守，平均數為 5.14；其次是共和黨，平均數為 5.09。受訪者的平均立場為 4.34，位於兩黨及兩黨總統候選人的中間。受訪者認為柯林頓及民主黨的意識型態立場

則較為開放，平均數分別為 3.15 及 3.18。整體而言在意識型態立場上，共和黨的平均立場似乎與受訪者的平均立場較為接近。

至於在「政府是否要盡量節省支出、還是要盡量提供服務」這個議題上，受訪者認為共和黨及杜爾的平均立場傾向節省支出，平均數分別為 3.07 及 3.16。受訪者的立場還是位在兩黨中間，平均數為 3.87。受訪者認為柯林頓及民主黨在這個議題上的立場則是傾向增加服務，平均數分別為 4.92 及 5.10。同樣地，在這個議題上，共和黨及杜爾的平均立場還是與受訪者的立場較為接近。

在「國防支出是否應該減少或增加」這個議題上，受訪者認為共和黨及杜爾的立場傾向於增加政府在國防上的支出，平均數分別為 4.74 及 4.67。受訪者立場的平均數為 4.04，仍是位在兩黨的中間。至於受訪者認為柯林頓與民主黨在這個議題上，立場傾向政府應減少國防上的支出，平均數分別為 3.92 及 3.79。與前兩個議題不同，在這個議題上，柯林頓及民主黨與受訪者的立場似乎較為接近。

最後在「政府應優先考慮保障工作機會，還是環境保護，即使是犧牲另一項議題亦在所不惜」上，受訪者認為共和黨及杜爾的立場比較傾向工作優先，平均數分別為 4.74 及 4.56。受訪者自己的立場仍是位在兩黨中央，平均數為 3.52。受訪者認為民主黨及柯林頓的立場則比較傾向環保優先，平均數分別是 3.36 及 3.43。所以在這個議題上，似乎是民主黨及柯林頓與受訪者的立場較為接近。

從上述四個議題立場的探討，我們發現選民對兩大黨及其總統候選人的議題立場，似乎有所認知，能夠在左右方向的尺度上，定義其所處的位置。而且從平均數來看，受訪者的平均位置均在兩黨及其總統候選人的中間地帶。根據 Fiorina 的另一項假設：當選民的議題立場位在兩黨中間時，選民愈可能有「分裂投

票」的傾向。因此接下來，我們要來看看是否在上述四個議題中，議題立場位在兩黨中間的選民，比較會有「分裂投票」的傾向。

如前所述，Fiorina 曾經發展出一種左右單向度的尺度，來解釋選民「分裂投票」的情形（請參見圖一）。當選民與某一黨立場越接近時，越傾向一致投票給該政黨；反之，當選民的立場越傾向位在兩黨中間時，選民將越無法判斷該投給哪一個政黨，結果便造成「分裂投票」。這個假設在經驗驗證上有兩個困難，首先究竟何者算是兩黨的「中間地帶」？比如說受訪者的立場是位於中間(M)與共和黨(M1)之間，我們沒有理由說選民一定會「分裂投票」，而不一致投票給共和黨。因此在 Fiorina 的尺度上，他將兩黨的中間地帶分成六等份(1996: 75)，只有立場位在最靠近中間(M)的兩個等分的選民，越可能傾向「分裂投票」。然而如何在經驗上明確界定「中間地帶」，實有其困難。

另一個經驗驗證上的困難，可以說是 Fiorina 所有假設上驗證上的困難。Fiorina 一再強調「議題立場」對選民投票的重要性，但是選舉當中的議題何其之多，選民考量的議題可能不只一個，不同選民考量的議題也不盡相同，而且選民對不同選舉的考量可能也不一樣(Jacobson, 1990)，因此在經驗驗證上，無法找出像「政黨認同」那樣明確又穩定的變數。Fiorina 便曾提到，個人的計算不能用經驗驗證，因為偏好的特質涉及理性抉擇途徑，要證明必須用空間模型或透過無異曲線來證明(1994: 448)。因此我們只有利用上面的四個議題，約略地驗證一下 Fiorina 所假設的模型。

表六是受訪者對上述四個議題的立場與「分裂投票」的相關。結果發現：只有受訪者的「意識型態立場」這個變數與 Fiorina 假設相符，並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即當選民意識型態立場位於兩黨立場中間時，比較有「分裂投票」的傾向。至於在「減少支出 v.s. 增加服務」與「國防支出」兩個議題上，均未達統計上的顯著

水準 ($p > .05$)。而受訪者對「環境保護 v.s. 工作機會」這個議題，雖然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但剛好與 Fiorina 的假設相反，立場愈在兩黨中間的受訪者，反而愈傾向一致投票。

表六：議題立場與「分裂投票」的交叉列表

次數分配百分比		分裂投票		合計	統計檢定
		否	是		
意識型態立場是否在兩黨中間	否	195+ (87.4%)	28- (12.6%)	223	自由度 1 卡方值 5.528 $p < .05$
	是	434- (80.5%)	105+ (19.5%)	539	
「政府是否應減少支出、或增加服務」是否在兩黨中間	否	190 (84.8%)	34 (15.2%)	224	自由度 1 卡方值 2.742 $p > .05$
	是	471 (79.8%)	119 (20.2%)	590	
「政府在國防上的支出應增加或減少」是否在兩黨中間	否	191- (78.0%)	54+ (22.0%)	245	自由度 1 卡方值 3.303 $p > .05$
	是	458+ (83.4%)	91- (16.6%)	549	
「環境保護重要、還是工作機會重要」是否在兩黨中間	否	225- (76.5%)	69+ (23.5%)	294	自由度 1 卡方值 8.086 $p < .005$
	是	421+ (84.7%)	76- (15.3%)	497	

註：「+」表示統計上顯著偏高；「-」表示統計上顯著偏低。

Fiorina 最後假設：因為選民意識到總統比眾議員對政策更具影響力，選民會將總統選票投給與自己議題立場較接近的政黨，因而形成不同類型「分裂投票」的組合。如果 Fiorina 的假設為真的話，相較於眾議員的政黨，選民的立場應該與所投的總統候選人之政黨立場較為接近。是故我們就上述四個議題，比較受訪者的立場、所投總統政黨的立場與所投眾議員的立場，來檢視是否受訪者的立場會與所投總統的政黨立場較為接近。

表七是受訪者與所投總統候選人政黨及所投眾議員候選人政

黨的議題立場相關係數。一般而言，受訪者自己的立場與所投總統候選人或所投票議員候選人的政黨立場都很接近，相關係數皆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text{sig} < .001$)。其中所投總統候選人政黨立場與受訪者立場的相關係數，又比所投票議員候選人政黨立場為高，在「意識型態」與「政府應盡量提供服務，或是盡量減少支出」這兩個議題上，受訪者的立場與所投總統候選人的立場相關程度，更是達到 60% 以上。這樣的結果顯示出，就受訪者所投的總統與眾議員候選人比較起來，受訪者與總統候選人的立場確實較為接近，符合 Fiorina 的假設，即選民會投票給與自己立場較接近的政黨總統候選人。

表七：受訪者與所投總統政黨及所投票議員政黨的議題立場相關係數

議 題	有效個案數	相關係數	Sig.	
意識型態	受訪者—總統黨	878	.621	.000
	受訪者—眾議員黨	877	.422	.000
提供服務 v.s. 減少支出	受訪者—總統黨	894	.623	.000
	受訪者—眾議員黨	896	.450	.000
國防支出	受訪者—總統黨	888	.472	.000
	受訪者—眾議員黨	883	.327	.000
環境保護 v.s. 工作機會	受訪者—總統黨	881	.558	.000
	受訪者—眾議員黨	878	.364	.000

三、選民期望模式

不過受訪者的立場與所投總統候選人的立場有關，這有兩種可能性存在，一是如同 Fiorina 所假設的，選民認為總統的權力比較大，所以選擇與自己立場接近的總統人選。另一個可能則是選民對總統與眾議員選舉所考量的議題不同，上述四個議題剛好是

與選民選總統有關的議題，所以相關係數高；反之，因為在眾議員選舉中，這四個議題對選民的投票決定影響不大，所以相關係數低。為了進一步釐清二者之間的關係，我們需檢證另一個解釋「分裂投票」的議題模式——「選民期望模式」。

在「選民期望模式」中，Jacobson 假設選民在總統、眾議員選舉中，考量的因素並不相同。總統選舉偏重全國性的因素，例如：經濟、國防、外交等議題；眾議員選舉則是偏重地方性議題，諸如選區服務、現任者因素等等。選民對政黨的期望也不相同，Jacobson 的研究發現，民主黨擅長分配性議題及選區服務，而共和黨剛好擅長經濟、外交等全國性議題，因此造就了 1980 年代「共和黨總統對民主黨眾議院」的「分治政府」模式。

雖然 Jacobson 也認為「分治政府」是有其選舉來源的，他也試圖從選舉的角度，來證明「分治政府」的成因是政治性因素，而非結構性因素(1990: 26-27)，但是 Jacobson 與 Fiorina 一樣，他們的模式都欠缺嚴謹的經驗驗證。Jacobson 主要是從總體資料來證明民主黨在國會中的種種優勢，包括民主黨的議員候選人選較佳、民主黨較擅長選區服務等，最後再用經驗資料證明選民對政府支出、預算分配、赤字等問題看法的矛盾之處，及選民對兩黨擅長議題確實有不同的認知，來支持其假設。但是時至今日，民主黨已不再是國會多數黨，而且本文的目的也不在於探討美國國會選舉政治的變遷，因此本文的重點將著重於驗證 Jacobson 對選民「分裂投票」行為的假設。

Jacobson 的假設驗證可以分成三個部分：(1) 選民對政府財政及預算分配等議題，是否存有弔詭的看法？即一方面希望政府提供更多服務，另一方面又不希望增加政府支出，這也就是所謂的「囚犯困境」。(2) 當選民面對「囚犯困境」時，是否會傾向「分裂投票」？(3) 選民對政黨的期望是否有所不同？即在選民的認知當

中，是否認為共和黨擅長處理全國性議題、民主黨擅長處理分配性議題，及選區服務？所以選民傾向總統投共和黨、眾議員投民主黨，以解決「囚犯困境」。

表八是受訪者在 1996 年選後，對聯邦政府各項財政支出是否應增加的看法，與 Jacobson 的假設一致，每一項支出絕大多數的受訪者都認為應該要增加或是維持原狀。在「防治犯罪支出」及「公立學校支出」上，有將近 70% 的受訪者認為要增加。五項支出中，受訪者認為應該減少的比例，都在 10% 以下。

表八：聯邦政府以下支出應增加、減少或維持原狀？

次數分配 (百分比)	增加	減少	維持原狀	合計
社會救助支出	799 (47.1%)	102 (6.0%)	794 (46.8%)	1695
環境保護支出	693 (40.9%)	139 (8.2%)	862 (50.9%)	1694
公立學校支出	1146 (67.6%)	101 (6.0%)	449 (26.5%)	1696
防治犯罪支出	1163 (68.3%)	85 (5.0%)	454 (26.7%)	1702
幼兒照顧支出	865 (51.7%)	179 (10.7%)	629 (37.6%)	1673
解決貧窮問題 支出	776 (46.0%)	202 (12.0%)	709 (42.0%)	1687

民主政府的要件之一，便是要適時反映人民的需求，當多數人要求政府各項支出均應增加的情況下，政府的總體支出勢必相對地成長。為了因應龐大的支出，政府有兩種因應方式，一是加稅，一是任由政府赤字增加。表九是受訪者對政府支出、赤字與稅賦三者的看法。一般而言，多數的受訪者均不願意犧牲三者任何一項。不過不同意「政府為了減少赤字而加稅」的比例最高，占

了 78.6%，而不同意「政府為了內政支出增加，而使赤字加大」的比例相對較少，只有 59.4%。

表九：受訪者是否同意以下議題

次數分配(百分比)	同意	不同意	合計
是否同意政府為增加內政支出（醫療、教育、高速公路），而使預算赤字擴大？	603 (40.6%)	882 (59.4%)	1485
是否同意政府為了減稅，而刪除內政支出計畫（醫療、教育、高速公路）？	390 (26.1%)	1104 (73.9%)	1494
是否同意政府為了減稅，而造成政府赤字增加？	412 (27.9%)	1065 (72.1%)	1477
是否同意政府為了增加支出而加稅？	429 (28.7%)	1064 (71.3%)	1493
是否同意政府為了減少赤字而減少支出？	455 (30.6%)	1032 (69.4%)	1487
是否同意政府為了減少預算赤字而加稅？	321 (21.4%)	1183 (78.6%)	1504

面對上述六種兩難情形，是否會促成選民「分裂投票」，以解決「囚犯困境」？表十是受訪者面對兩難困境與是否「分裂投票」的交叉列表。在六種情形當中，只有受訪者是否同意政府「為了減稅而刪減支出」及「為了減少赤字而刪減支出」二者與是否分裂投票之間，達到統計上顯著水準。當受訪者表示不同意政府為了減稅或減少赤字而刪減支出時，越傾向「分裂投票」，分別有 19.9% 及 20.5%。這樣結果顯示出，在美國財政赤字日益嚴重的今天，當選民越不希望內政支出遭到刪減時，越有可能「分裂投票」，藉以解決賦稅或財政赤字增加的兩難困境。

表十：政府財政議題與是否「分裂投票」的交叉列表

次數分配(百分比)		一致投票	分裂投票	統計檢定
是否同意政府為了支出增加，而使赤字擴大？	同意	269 (81.8%)	60 (18.2%)	自由度 1 卡方值.021 p> .05
	不同意	474 (82.1%)	103 (17.9%)	
是否同意政府為了減稅，而刪減支出？	同意	213+ (86.9%)	32- (13.1%)	自由度 1 卡方值 6.039 p< .05
	不同意	534- (80.1%)	133+ (19.9%)	
是否同意政府為了減稅，而使赤字擴大？	同意	189 (84.8%)	34 (15.2%)	自由度 1 卡方值 1.622 p> .05
	不同意	551 (81.0%)	129 (19.0%)	
是否同意政府為了支出增加而加稅？	同意	196 (79.7%)	50 (20.3%)	自由度 1 卡方值 1.481 p> .05
	不同意	554 (83.2%)	112 (16.8%)	
是否同意政府為了減少赤字而減少支出？	同意	261+ (87.3%)	38- (12.7%)	自由度 1 卡方值 8.651 p< .005
	不同意	481- (79.5%)	124+ (20.5%)	
是否同意政府為了減少赤字而加稅？	同意	160 (79.2%)	42 (20.8%)	自由度 1 卡方值 1.525 p> .05
	不同意	592 (83.0%)	121 (17.0%)	

註：‘+’表示統計上顯著偏高；‘-’表示統計上顯著偏低。

Jacobson 曾以《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及 CBS 的民意調查資料，分析 1981 至 1988 年民眾對兩黨處理議題能力的看法，結

果發現共和黨擅長「促進經濟繁榮」、「處理通貨膨脹」及「避免戰爭」等議題；民主黨則是擅長「解決失業問題」、「維持醫療保險」、「社會救助」、「使預算公平分配」及「關心民眾需要」等議題 (1990: 112-115)。在 NES 選前面訪的問卷中，也曾針對上述類似的幾個議題，詢問受訪者認為哪一個政黨比較能處理好 (見表十一)。不過 NES 為了避免問卷過長，影響到調查資料的信度與效度，有一些題目是採取隨機列出的方式，因此有關政黨處理議題能力的這些題目，只有一半的受訪者被問到。不過我們仍可透過這些議題變數的次數分配，一窺選民對政黨處理各項議題能力的看法。

表十一：哪一政黨擅長處理以下議題

次數分配(百分比)	民主黨	共和黨	兩黨差不多	合計
經濟議題	276 (32.1%)	270 (31.4%)	314 (36.5%)	860
外交關係	230 (26.9%)	324 (37.8%)	302 (35.3%)	856
健康照顧	435 (50.7%)	149 (17.4%)	274 (31.9%)	858
社會福利	328 (38.1%)	323 (37.5%)	210 (24.4%)	861
貧窮問題	398 (46.5%)	161 (18.8%)	297 (34.7%)	856
預算赤字	229 (26.7%)	286 (33.3%)	344 (40.0%)	859
環境保護	376 (44.0%)	110 (12.9%)	368 (43.1%)	854
犯罪問題	208 (24.3%)	267 (31.1%)	382 (44.6%)	857
刪除社會救助補助	91 (10.6%)	426 (49.7%)	340 (39.7%)	857
改善種族關係	320 (37.4%)	70 (8.2%)	466 (54.4%)	856
最有可能加稅	304 (35.3%)	254 (29.5%)	303 (35.2%)	861

避免戰爭	105 (12.3%)	164 (19.1%)	589 (68.6%)	858
------	----------------	----------------	----------------	-----

表十一共列有十二個議題，整體而言，大多數的受訪者都是認為兩黨處理議題的能力「差不多」，像「避免戰爭」、「改善種族關係」等議題，更是有過半數以上的受訪者認為兩黨的處理議題的能力沒什麼差別。至於在「健康照顧」、「解決貧窮問題」、「環境保護」、「社會福利」及「最有可能加稅」等議題上，多數受訪者認為民主黨比較擅長。相較之下，多數受訪者認為共和黨比較擅長的議題為「外交關係」與「刪除社會救助補助」。這樣的結果，與一般人對「民主黨偏重分配性議題、共和黨擅長外交國防」的印象相符，符合 Jacobson 對選民期望的假設。

從表十一的分析，驗證了 1996 年美國選民對於兩黨擅長處理的議題，確實存有差異。不過表十一所包含的議題偏重於全國性的議題，Jacobson 與 Zupan 在解釋美國選民的「分裂投票」行為時，另一個解釋的重點在於強調選區服務對眾議員選舉的重要性。由於美國眾議員選舉現任者連任的比例偏高，多數學界將之歸功於選區服務，而且在 1994 年以前，民主黨的現任者居大多數，因此有些學者在驗證「選民期望模式」時，甚至直接將現任者因素拿來解釋民主黨在眾議員選舉中的優勢 (Alvarez and Schousen, 1993)。

但是歷經 1994 年的期中選舉，美國國會的多數黨已不再是民主黨，到了 1996 年時，對選民而言，所謂的眾議員「現任者」，可能多數是指共和黨。表十二受訪者對選區現任者與選區接觸的評價及與選區現任者政黨的交叉列表，藉由表十二，我們可以進一步驗證 Jacobson 的假設：是否民主黨人比起共和黨人，更擅長選區服務。

表十二：受訪者對現任者與選區接觸的評價及與選區現任者政黨的交叉列表

次數分配 百分比	受訪者選區的現任者		合計	統計檢定
	民主黨	共和黨		
非常好	136 (44.4%)	170 (55.6%)	306	自由度 3 卡方值 2.449 p>.05
好	244 (40.5%)	358 (59.5%)	602	
不好	91 (45.0%)	111 (55.0%)	202	
非常不好	57 (39.3%)	88 (60.7%)	145	
合計	528 (42.1%)	727 (57.9%)	1255	

從表十二的數據中，我們可以看出，受訪者對現任者選區服務的評價，與兩黨現任者並無顯著相關，換句話說，基本上受訪者對兩黨現任者選區服務的評價都差不多，並沒有說受訪者認為民主黨的選區服務比共和黨好的情形。整體而言，半數以上的受訪者對自己選區的現任者感到滿意。

所以從表十一及表十二的分析，Jacobson 及 Zupan 的假設並無法解釋 1996 年美國選舉的結果，及選民的「分裂投票」行為模式。首先在表十一中，受訪者對兩黨期望的差異，與 Jacobson 先前的假設相符。但是美國自 1994 年以來的「分治政府」，是民主黨擔任總統、共和黨為眾院多數黨的局面。我們在表一的資料中也可看出 1996 年美國選民的「分裂投票」行為，傾向總統投民主黨、眾議員投共和黨的組合，與 Jacobson 及 Zupan 所假設的結果

剛好相反。再者，在「民主黨擅長選區服務」這項議題上，在 1996 年的資料中，也沒有充分的證據支持這種說法。

Abramson 等人 (1995: 323-331) 分析共和黨在 1994 年國會大選的勝利，認為原因可能有三，一是因為柯林頓的聲望不佳，選民對其滿意度低於 50%，所以無法拉抬同黨國會候選人的聲勢，甚至造成選民不想投給民主黨的候選人。其次是受 1992 年國會醜聞的潛在影響，選民普遍對當時國會現任者不滿，這對過去久居國會多數黨的民主黨不利，而且 1992 年及 1996 年的獨立總統候選人裴洛在 1994 年期中選舉時，除了大力批評柯林頓與民主黨國會阻礙美國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簡稱 NAFTA)，並四處演講要求選民不要投給民主黨，這些因素多少都對民主黨的選情產生影響。第三個可能因素是共和黨候選人在選前提出「與美國簽約」(Contract With America) 的號召，允諾只要讓共和黨成為國會多數黨，參與簽約的共和黨國會議員，將會於議會開議的一百天內，通過大多數選民所支持的十項法案。⁵ 此舉不但將美國國會選舉提昇至全國性選舉的層次，並因應當時選民對民主黨現任者不滿的情勢，促使共和黨一舉奪下參眾兩議院多數黨的寶座。

到了 1996 年，美國情勢基本上還是延續 1994 年的情況，儘管美國經濟情況好轉，通貨膨脹及失業率下降、國民所得提高，而這往往是影響總統選舉勝敗的關鍵因素 (Abramson *et al.*, 1995: 203-207)，但是柯林頓的聲望總是拉抬不上來。再加上美國民眾普遍對政治不信任，所以傾向以「分治政府」來促成政治權力彼此制衡 (White *et al.*, 1998: 16-19)。因此 Jacobson 及 Zupan 對單一方

⁵ 這十項法案包括：1. 平衡預算；2. 遏止暴力犯罪；3. 改革社會福利制度；4. 保護幼兒；5. 已婚者(家庭)減稅；6. 強大國防；7. 提高退休年限；8. (經濟上)減少政府干預；9. 促進法律規定一般化、平民化；10. 國會議員的任期限制。

向「分裂投票」的假設，並無法解釋 1996 年選民「分裂投票」的方向，即使選民在面對「囚犯困境」時，可能傾向「分裂投票」，但不表示選民就會因而投給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與民主黨的眾議員候選人。

伍、結論

本文的目的在於驗證兩個議題模式——「政策中和模式」與「選民期望模式」，對 1996 年美國選民「分裂投票」行為的解釋力。由於社會科學資料先天上的限制，我們無法像自然科學一樣，客觀地排除其他相關因素做分析，因此本文所採用的「交叉分析」方法，只是簡單地比較自變數與依變數之間的相關，自、依變數之間是否存有中介變數或自變數之間的關係與重要性，仍有待進一步的處理。資料來源是以美國密西根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y) 在美國 1996 年大選前後的面訪資料，本文所得出的結論如下：

- 一、受訪者的政黨認同與「分裂投票」行為顯著相關。政黨認同越強的受訪者，越傾向不會「分裂投票」，反之政黨認同越弱的受訪者，則越傾向「分裂投票」。在「分裂投票」的方向上，政黨認同越強的受訪者，越傾向一致投票給所認同的政黨。兩黨認同弱的選民，則傾向一致投票給所認同的政黨，或是「分裂投票」——將總統選票投給所認同政黨的「分裂投票」組合。
- 二、在「政策中和模式」上，與 Fiorina 的假設相符，受訪者能夠在單一向度的議題尺度上，定位兩黨及其自身立場。當受訪者意識型態立場位於兩黨中間時，選民確實會傾向「分裂投票」，而且相較於所投眾議員候選人政黨，受訪者的立場與所投總統候選人的政黨立場較為接近，顯示受訪者確實會傾向投給與自

己立場較接近的總統候選人。

三、至於在「選民期望模式」上，受訪者對財政問題的看法，確實存有兩難的「囚犯困境」，而且受訪者也傾向會以「分裂投票」來解決「囚犯困境」。不過，在「分裂投票」的方向上，Jacobson 及 Zupan 假設，基於選民過去對共和黨擅長全國性議題、民主黨擅長分配性議題的印象，選民會傾向投給共和黨的總統及民主黨的眾議員。經由我們的分析發現，受訪者確實對兩黨存有上述的印象差異，但是 1996 年的選舉結果及相關的實證資料，卻與 Jacobson 及 Zupan 的假設不符，民主黨在選區服務及眾議員選舉中的表現，並未比共和黨人為佳。

因此整體而言，在美國 1996 年的選舉中，政黨認同的強弱確實是解釋選民「分裂投票」與否的關鍵因素。至於「政策中和模式」及「囚犯困境」理論模式，雖然解釋力有限，但是多少可以解釋選民選擇「分裂投票」的傾向。

誌謝

本文能夠順利完成，首先要感謝美國密西根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y) 提供豐富且品質良好的資料，讓世界各地有心研究美國選舉的人士，都能分享此一豐沛的研究素材。其次非常謝謝王碩顯學長及鄭夙芬學姐賢伉儷，不辭辛勞地從海外代為下載該中心剛釋放出的資料，以及學妹林瓊珠小姐在論文寫作期間，所給予筆者的種種鼓勵與全程協助。最後筆者特別要感謝政大政治系劉義周老師在論文構思、寫作及資料收集與分析上，給予筆者諸多寶貴的建議與協助，這也是這篇論文能夠得以如期完成的動力所在。筆者在此謹向上述人士表達最

誠摯的謝意。

許增如小姐現任職於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民國八十三年東吳政治系畢業，民國八十四年高考二級及格，民國八十五年政大政治所畢業。

參考文獻

- Alesina, Alberto and Howard Rosenthal.
(1989) "Partisan Cycles in Congressional Elections and the Macroeconom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3: 373-398.
- Alford, John and David W. Brady.
(1988) "Partisan and Incumbent Advantage in U.S. House Elections, 1846-1986." Working Paper Number 11.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nstitutions and Values, Rice University.
- Alvarez, R. Michael and Matthew M. Schousen.
(1993) "Policy Moderation or Conflicting Expectations—Testing the Intentional Models of Split-Ticket Voting." *American Politics Quarterly* 21, Issue 4: 410-438.
- Abramson, Paul R., John H. Aldrich and David W. Rohde.
(1995)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the 1992 Elections*.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
- Beck, Paul Allen, Lawrence Baum, Aage R. Clausen and Charles E. Smith.
(1992) "Patterns and Sources of Ticket Splitting in Subpresidential Voting."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6: 916-928.
- Born, Richard.
(1984) "Reassessing the Decline of Presidential Coattails: U.S. House Elections from 1952-80." *Journal of Politics* 46: 60-79.
(1994) "Split-Ticket Voters, Divided Government, and Fiorina Policy-Balancing Model." *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 19: 95-115.

- Broder, David S.
(1972) *The Party's Over: The Failure of Politics in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Burham, Walter Dean.
(1970) *Critical Election and the Mainsprings of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 Calvert, Randall and John A. Ferejohn.
(1983) "Coattail Voting in Recent Presidential Electio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7: 407-419.
- Campbell, Angus, Philip Converse, Warren Miller and Donald Stokes.
(1960) *The American Voter*. New York: Wiley.
- Campbell, Angus and Warren E. Miller.
(1957) "The Motivational Basis of Straight and Split Ticket Voting."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1: 293-312.
- Campbell, James E.
(1986) "Predicting Seat Gains from Presidential Coattail."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0: 165-183.
- Cook, Phodes.
(1989) "Key to Survival for Democrats Lies in Split-Ticket Voting."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Weekly Report* 47, July 8, 1989.
- Downs, Anthony.
(1957)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Erikson, Robert S.
"The Puzzle of Midterm Loss." *Journal of Politics* 50: 1011-1029.
- Ferejohn, John A.
(1987) "On the Decline of Competition in Congressional Electio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1: 166-176.

Fiorina, Morris P.

- (1981) *Retrospective Voting in 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88) "The Reagan Years: Turning to the Right or Grouping toward the Middle?" In *The Resurgence of Conservatism in Anglo-American Democracies*, eds. by Barry Cooper, Allan Kornberg, and William Mishler.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1989) *Congress: Keystone of the Washington Establishment*. 2nd ed.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90) "An Era of Divided Government." In *Developments in American Politics*, ed. by Bruce Cain and Gillian Peele. London: Macmillan.
- (1994) "Split-Ticket Voters, Divided Government, and Fiorina Policy-Balancing Model-Response." *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 19: 117-125.
- (1996) *Divided Government*. 2nd ed., Needham Heights: Allyn & Bacon A Simon & Schuster Company.

Jacobson, Gary C.

- (1985a) "Congress: Politics After a Landslide Without Coattails." In *The Elections of 1984*, ed. by Michael Nelson.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 (1985b) "Money and Votes Reconsidered: Congressional Elections, 1972-1982." *Public Choice* 47: 7-62.
- (1989) "Congress: A Singular Continuity." In *The Elections of 1988*, ed. by Michael Nelson.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
- (1990) *The Electoral Origins of Divided Government*. Boulder: Westview.
- (1991) "The Persistence of Democratic House Majorities." In

- The Politics of Divided Government*, eds. by Gary W. Cox and Samuel Kernell.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 (1992) *The Politics of Congressional Elec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 Jacobson, Gary C. and Samuel Kernell.
(1983) *Strategy and Choice in Congressional Elections*, 2nd ed. New Haven, Connecticut: Yale University.
- Key, V. O., Jr.
(1966) *The Responsible Electorate: Rationality in Presidential Voting 1936-196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oSciuto, Leonard A.
(1972) "A National Inventory of Television Viewing Behavior." *Television and Social Behavior* 4: 38-85.
- Maddox, William S. and Dan Nimmo.
(1981) "In Search of the Ticket-Splitter."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62: 401-408.
- Mayhew, David R.
(1974) *Congress: The Electoral Connection*. New Haven, Connecticu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McAllister, Ian and Robert Darcy.
(1992) "Sources of Split-Ticket Voting in the 1988 American Elections." *Political Studies* 40: 695-712.
- Miller, Arthur H., Ann Hildreth and Christopher Wlezien.
(1988) "Social Group Dynamics of Political Evaluations." Paper deliver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Chicago, Illinois, April 14-16, 1988.
- Mondak, Jeffrey J.
(1989) "Could George Bush Have Had Coattails?: Republican Opportunities in 1988." Paper deliver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tlanta, Georgia. August 31-September 3, 1989.

Olson, Mancur.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etrocik, John R.

(1991) "Divided Government: Is It All in the Campaigns?." In *The Politics of Divided Government*, ed. Gary W. Cox and Samuel Kernell.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Pp. 13-38.

Sundquist, James L.

(1983) *Dynamics of the Party System*.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Thurber, James A.

(1991) *Divided Democracy: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between the President and Congress*. Washington, D. 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Press.

Wattenberg, Martin P.

(1990)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Political Parties: 1952-198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The Republican Presidential Advantage in the Age of Party Disunity." In *The Politics of Divided Government*, ed. Gary W. Cox and Samuel Kernell.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Pp. 38-61.

White, John E., Scott H. Huffmon and Christopher D. Martin.

(1998) "Split Decision in the 1996 Elections: A Democratic Presidency and a Republican Congress." *Votes and Opinions*: 16-19.

Zupan, Mark A.

“An Economic Explanation for the Existence and Nature of Political Ticket Splitting.”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4: 343-369.

**The Split-ticket Voting Behavior of the 1996 American Electorate—
Exploration of Two Issue Models**

Tseng-Zu Hsu

Abstract

When we study voting behavior, we used to say that party identification is the dominant explanatory variable. But with the increase in split-ticket voting in the American elections, party identification has been declining and voters are less affected by party affiliations. These changes also push researchers to look for other factors to explain split-ticket-voting behavior.

There are two issue models explaining split ticket voting. The first is the “policy-moderation model,” which assumes that split-ticket voters wish to have a divided government, to have administrative and legislative powers belong to different parties, and to balance policy output.

The second model comes from voters’ expectations. This model assumes that voters have different expectations of the President and Congress, and that the two main parties excel in different issues. Consequently, voters are motivated to vote split ticket by their different expectations.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test these two models which the 1996 survey data. We found that the strength of party identification is still the dominant variable, and that both of the models have explanatory power.

Key Words: split-ticket voting, the policy moderation model, the voters’ expectation model, divided government, party identification